

“深度翻译”在中国传统文化英译中的应用研究：回顾与展望

潘德

(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教育集团, 云南 昆明 650503)

【摘要】本世纪伊始,从阐释人类学中衍生而来的深度翻译理论开始受到中国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英译实践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梳理了国内近二十年来有关“深度翻译”的研究成果,从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两个层面,结合与我国传统文化英译相关的主要文本类型,探讨译者综合运用译文内和译文外“深度翻译”策略阐发文学文化翻译中蕴藏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从文本层面揭示该策略在文学文化译本中的可行性与创造性,为以后相关中国文化英译与跨文化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多元路径。

【关键词】阐释学;深度翻译;多元路径;传统文化英译

一、从阐释学到“深度翻译”

阐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诠释学、释义学、解释学,是一门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学科,是一种“解释的艺术”。它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强调重视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阐释学起源于古希腊,是一种哲学思潮,可理解为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涵盖几乎所有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是当代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渗透的主流趋势。阐释学诞生于19世纪初期,代表学者为来自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斯坦纳、伽达默尔等。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美国人类学家倡导通过显微式的深度描写,建立文化志,从而获得对文化解释之上的理解,重塑文化意义之网。后来,美国文化学者阿皮亚在翻译非洲加纳库马斯谚语时采用了密集型加注的翻译方法,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翻译研究方法,借助注释和附注如序言、脚注、尾注、文内释义、文外说明、案语、附笔等建立深厚的语言与文化背景的翻译,以此来表现对他者文化的尊重。经过不断发展,深度翻译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十分注重异质文化中的细微差异,主张彰显译者的主体地位,尽量以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去阐释,这对中国经典典籍、中国传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等类似文本的翻译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二、深度翻译的国外研究现状

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在国内有“厚翻译”、“厚重翻译”与“丰厚翻译”等译法,源头可追溯至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提出的“深度描

写”。197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论文《深度描写: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中借用这一概念,说明文化就是符号的集合,是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必须基本“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来进行描写,对他族文化再次认识与阐释,从而获得对文化的真正认知。

人类学与翻译研究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学科,但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因而在阐释层面,民族志的描写与翻译的解释是相通的。1993年,美国非裔政治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将该理念引入翻译研究,并正式提出“深度翻译”理论,核心要义是“深度语境化,即在翻译文本过程中采用添加脚注、注释、评注等方法,以便将文本置于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与语境之中,进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互相融合”。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深度翻译通过增加诠释性材料,构建出一个读者和文本的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互动空间,即在译文中构建一个“意义网”,借以促进目的语读者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与理解,以及表达对源语言文化的尊重。

2003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翻译理论学家西奥·赫曼斯在文章《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丰厚翻译》中指出丰厚翻译反映了跨文化翻译研究认识论上的复杂性与政治上的隐含性,结合典型翻译案例来佐证深度翻译是一种使得译文更加丰富多元的可靠手段。此外,已故法国文论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他的专著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中提出了副文本的概念,而这些副文本的导读性、评价性功能本质上就属于一种深度翻译的外在形式。

无论是格尔茨的跨越精神,阿皮亚的开拓之举,亦或赫曼斯的实证批判、热奈特的创新提法,都无不证明深度翻译之法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中的丰富文化与历史语境,由此可见,深度翻译在翻译实践中已经逐渐被人接受并得到了国外翻译界的广泛认同。

三、深度翻译的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于国外研究,深度翻译的国内研究则相对丰富得多,尽管引入时间不足30年,但已引发国内学界广泛关注。初期由于学界译名并未统一,因而笔者在CNKI上分别用“深度翻译”与“厚翻译”进行搜索,找到相关论文共计126篇。

从时间分布来看,2010之前国内研究寥寥无几,之后便呈逐年上升趋势。51篇核心期刊论文多为近十年发表,2014年后的论文占总数的86.27%,亦有不断攀升趋势。

从学科分布来看,学位论文共计78篇,涵盖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硕士三大二级学科,其中又以翻译专业硕士论文居多,1篇硕士论文出自中国语言文学。

从论文类别来看,直接相关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77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51篇,51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中,理论研究27篇,案例分析24篇,整体来看,目前研究仍然以结合理论的案例分析论文为主体。

(一) 理论研究方面

与深度翻译相关的论文为2014年湖南师范大学宋晓春的博士论文,作者采用阐释人类学深度描写的方式,选取《中庸》相关的五种译作,从译本中的地方性知识出发,以译本中的深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显微式地记录各译本深度翻译的表现形态、思想路径及具体功效,证明深度翻译的实质就是阐释性的翻译,只有译者的存在镜域与翻译的阐释语境完美结合才能使富有创见的翻译阐释成为可能。

深度翻译理论研究的论文多为论证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类翻译的可行性,例如,中国经典典籍、中国传统文学、少数民族活态史诗、人文历史等。段峰(2006)认为,深度翻译是翻译实践中一种常用方法,理论渊源来自于文化人类学的深度描写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有关的历史语境理论。孙宁宁(2010)基于格尔茨深度描写理论,探讨翻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阐明深度翻译诠释的本质。王岫庐(2013)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两个方面讨

论了深度描写到深度翻译的发展,以及对翻译活动带来的影响与思考。曹明伦(2014)用辩证的眼光论证了深度翻译的实用性,并指出了译文“当令易晓,勿失厥义”的评判标准及操作原则。黄小芄(2014)对深度翻译的概念、目的、缘由与方法进行了初步梳理。王治国(2014)通过对媒介新词的英译问题的剖析,指明深度翻译在汉语媒介新词英译中的应用前景。周领顺(2016)一针见血地对厚译(深度翻译)的误读进行澄清,警示大家在引进西方译学理论时要保持理性,持有批判反思的精神。葛厚伟(2017)从深度翻译的角度,指出了民族文化典籍英译的必要性,并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翻译策略。任凤伟(2018)、熊伟(2019)分别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探索了包括深度翻译在内的中华典籍及壮族民俗文化外译的传播途径与出版策略。王治国(2019)提出了借鉴民族志诗学、深度描写和多模态话语,构建涵盖少数民族活态史诗语言、文化和语境三重维度的多模态翻译模式。朱建平(2019)借用道家心论“虚一而静”和“因顺外物”的主张对深度翻译可能出现的因译者主动性导致的随意发挥或过渡操纵的缺陷加以理性约束,以求客观对待异质文化。蒋辰雪(2021)通过深度描写性分析,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看待中医药文化翻译,有利于中医在西方社会“他我”形象的构建,推动中西多元立体发展。岳曼曼(2021)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究深度翻译在意义理解和文化传播中的认知价值与运作方式,从完善认知模型、激活认知框架、联结心理通道和促进认知定位四个方面论述翻译理论建设。

(二) 案例分析方面

通过笔者爬梳,案例分析的101篇论文(期刊24,学位77)文本内容可分为十二大类型:中国典籍、中国文学、地理文本、民族文本;外国文学、历史文本、中医文本、学术文本;科技文本、艺术文本、政治文本、体育文本。它们呈现出三大梯队:排名1-4为第一梯队。排名5-8为第二梯队、排名9-12为第三梯队。

在第一梯队中,中国典籍在所有文本中占比最高,高达30.69%,这与深度翻译的理论属性与应用领域高度契合;就作品分布来看,《楚辞》出现的频率最高,其它高频出现的作品为四书五经及其它经典典籍等。宋晓春(2014)以《中庸》的三个英译本为例,分析了《中庸》英译本深度翻译特征,说明了其“文化阐释”功能对文学典籍思想传播的

推动作用。许敏(2016)基于《周易》英译本的深度翻译研究,提出深度翻译不失为中国典籍英译的良策。段彦艳(2016)、张虹(2020)从深度翻译的角度对《孝经》中的误读现象加以纠正并重构,深度探讨了译者主体性。朱健平(2019)考察了《墨子》英译本的具体表征,说明译者综合运用译文内和译文外深度翻译策略阐发中国典籍的借鉴意义。排名第二的为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类文本,随着深度翻译理论研究应用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深度翻译理论来指导分析中国文学向外译介。在第一梯队中,地理人文类与民族文学文化类所占比例比较接近,随着近年来中国文化不断输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为主。李雁(2014)从深度翻译角度分析《红楼梦》法译本中的文化现象,根据“realia理论”和“副文本”理论总结“深度翻译”的类型和实施方法。

在第二梯队中,外国文学与历史文本所占比例趋同,反映出深度翻译策略在人文科学文本中的强大能动性普遍适用性。文军(2016)以《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译本为例,分为正文深度翻译、紧密型深度翻译和疏离型紧密翻译三个层面探究深度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对译者身份构建的启发。王治国(2017)分别以《苗族史诗》中的民俗事象、英译壮族史诗《布洛陀史诗》为主要文本,分析了深度翻译对民族活态史诗以及民族文化典籍英译的“文化阐释”作用。令人欣喜的是,更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医学,使得中国国粹之一的中医文化得以弘扬与传播。

在第三梯队中,该类型文本中对深度翻译理论的运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应用领域主要为传统艺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涂传飞(2010)分别从阐释人类学角度探讨了民俗体育文化的意义以及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个案研究的人类学思考。科技艺术文本方面,许明武(2017)在《中国翻译》撰文以《天工开物》译本为例,从资本视角剖析指出深度翻译策略是特定社会背景下各种资本综合干预互相作用的产物。李冉(2018)、徐建玲(2020)分别对欧洲建筑演变史和江西客家建筑风格进行了深度翻译理论解读。陈宁(2016)、王振威(2019)各自对中国陶瓷艺术与中国书法艺术中的典故文化加以探讨,拓宽了深度翻译的研究领域,令人耳目一新。政治类文本分析近年来开始出现,刘贺田(2018),

谭素琴(2022)分别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毛泽东著作《寻乌调查》进行了分析,让人们看到了深度翻译在中国特色政治文献英译中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深度翻译不仅为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觅得理论基础与“他者视角”,而且为译者深度描写诠释源语言文化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路径,尤其在中国典籍、中国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翻译过程中,深度翻译策略更能彰显出其得天独厚的诠释优势。本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英译必须以中华文化为地方性知识参考,深入挖掘文本中的深度翻译诠释策略,致力发展和完善深度翻译理论构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今后文化内涵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译与跨文化交际提供更为多元化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 曹明伦. 当令易晓, 勿失厥义——谈隐形深度翻译的适用性[J]. 中国翻译, 2014(3): 112-114.
- [2] 段峰. 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及翻译研究[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90-93.
- [3] 黄小芄. 再论深度翻译的理论和方法[J]. 外语研究, 2014(2): 72-76.
- [4] 李红霞, 张政. “Thick Translation”研究二十年: 回顾与展望[J]. 上海翻译, 2015(2): 1-2.
- [5] 龙吉星.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初探[J]. 中国翻译, 2013(5): 5-9.
- [6] 彭桂芝, 何世杰. 中外翻译史解读[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297-298.
- [7] 师占成. 对克利福德·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解读[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107-110.
- [8] 宋晓春. 阐释人类学视阈下的《中庸》英译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16-21.
- [9] 岳曼曼. 深度翻译的认知价值与实现形式[J]. 外语教育与研究, 2021(4): 594-605.
- [10] 周领顺. “厚译”究竟有多厚?——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与反思之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6): 103-112.

作者简介: 潘德, 1987.09, 男, 汉族, 四川巴中, 硕士, 研究方向: 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